

《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及其美学意蕴

马丹 马春相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沈从文小说《边城》营造出了一片人间净土——湘西世界。其中的人性虽十分美好,但人心之间却充满了隔膜,以至于无论多么真诚善良相爱的人,彼此之间似乎谁也无法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这真正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底蕴,因而也能激发读者深长的人生感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悲悯之情,作品也由此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形而上的美学意蕴。

关键词:边城;人心隔膜;宿命;悲剧成因;艺术境界

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5-0073-04

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描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精心营造出了一片人间净土。其中不仅有青山绿水,奇异的民俗,淳朴的人情,更有纯净如水的两性之爱。这片人间净土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拨动着读者返朴归真的浪漫心弦。但《边城》所营造的湘西世界虽犹如人间净土,整个作品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不仅来自命运的无常,更来自人心间的隔膜。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关于《边城》中人心隔膜的成因、美学特征,以及其对作品所形成的独特艺术境界之影响的专题研究,似乎依然阙如,故笔者愿意在这一方面做尝试性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边城》中的人心隔膜不是出现在敌对者之间,湘西世界没有彼此不共戴天的敌对者;《边城》中的人心隔膜也不是出现在陌生人之间,湘西世界里的陌生人常常一见如故,彼此暖意融融,如小说第六节描写了过河的客商想要给老船夫摆渡费,老船夫和孙女坚决不要的情景。该场景描写的虽是陌生人的初次见面,却洋溢着欢声笑语,让我们丝毫看不到人心隔膜的影子。《边城》中其他许多关于民情风俗的描写,也证明了当地普通人群之间不存在人心隔膜;相反,《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出现在最亲者和最相爱

者之间。这里有老船夫与孙女翠翠之间的人心隔膜。老船夫不知道翠翠心仪的是谁,却一心想促成她与天保大老的婚姻。当老船夫谈起大老的提亲之事时,翠翠“总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1](P255)}。祖父和孙女谈了多次,依然没有结果。老船夫不理解翠翠那怀春少女所特有的微妙复杂情怀,翠翠则羞于同时也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让老船夫了解自己的心事,以至于老船夫“猜不透这件事情在这什么方面有个疙瘩,解除不去。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1](P257)}。这里有翠翠与二老之间的人心隔膜。翠翠13岁那年在端午赛龙船的盛会上与爷爷走散,在夜幕降临倍感焦急之时,得到了素有“岳云”之称的傩送二老相助方得返回渡口,从此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平添了一桩微妙的心事。但在面临婚姻选择时,纯真的翠翠始终不肯明言自己钟情的是二老,这其实还关系不大,因为当地青年男女有以唱山歌的方式求爱的习俗,翠翠只须在二老唱山歌求爱时,同样以山歌回应就可以了。可是当那个月明之夜,二老在翠翠居处对溪高崖上竹林里通过“走马路”的方式唱山歌向翠翠表达爱慕时,翠翠偏偏“因为日里哭倦了,睡得正好”^{[1](P265)},而老船夫又不忍惊动她。接下来的几个

收稿日期:2018-05-22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青年项目(QN2016039);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6ZZX231)

第一作者简介:马丹(1986-),女,云南鲁甸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日子,老船夫“一到了晚间就故意从别样事情上,促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1](P266~267)},而月光下的翠翠心里也“当真原意听一个人来唱歌”,但“久之,对溪流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外别无所所有”^{[1](P268)}。而那晚唱了一夜山歌的二老,因为没有得到翠翠的对歌回应,心中自然极其失望。而大老因歌声不如二老动听,知道自己将会是这场爱情竞争的失败者,于是主动退出以成全弟弟,为了忘却烦恼,“坐了那只新油船向下河走去了”^{[1](P266)}。手足情深的二老尚未得到爱情,却先已伤害亲兄长,故而心情所受的影响可想而知,因此“有机会唱歌却从此不再到碧溪岨唱歌”^{[1](P270)}。后来由于大老之死的刺激以及被父亲逼迫接受碾坊,二老自然更无心情去唱歌了,甚至认为自己“做傻子在那边岩上唱过一晚的歌”^{[1](P274)}。小说第17节叙述二老又过川东去办货,过渡时见到老船夫,老船夫欲化解误会,因而叫翠翠出来相见,而翠翠偏偏又上山掘竹鞭笋去了,未能现身,使得二老对老船夫及翠翠的误解又增加了一层。第18节写二老从川东押物回到了茶峒,在码头边喊过渡,翠翠发现是二老,羞涩的她“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1](P278)}。二老不明白翠翠作为纯真少女的羞涩心理,以为“前途显然有点不利”^{[1](P280)}。加之老船夫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儿气恼”^{[1](P280)}。这里有二老与大老之间的人心隔膜。为了在爱情竞争中“公平”起见,二老提议“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岨去唱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1](P260)},但二老却没有想到,这种“公平”对自尊心极强的大老其实是一种伤害。这里还有老船夫与顺顺父子之间的人心隔膜。身为自己女儿与军人爱情悲剧的见证者,老船夫自然不希望悲剧在孙女身上重演,因而发自内心地祈盼她获得爱情幸福。由于尊重孙女在爱情选择上的自主性,因此对于大老的“走车路”求婚,老船夫一直未敢明确表态,以致大老对他发生了误会,“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1](P259)}，“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1](P259)}。而天保傩送兄弟月夜去碧溪岨为翠翠唱歌之事发生后,老船夫虽然一开始把唱歌之人误会为了大老,但当他得知真相并了解大老决心退出爱情竞争后,转而竭力想促成翠翠与

二老的爱情。但天有不测风云,大老意外遇难之事接踵而至,老船夫也因此受到了顺顺与二老的冷淡。老船夫曾想告诉二老其唱歌那天晚上翠翠在梦中的反应,但二老却认为老船夫“做作”。二老甚至对人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老大是他弄死的。”^{[1](P275)}在受到顺顺父子冷遇的情况下,老船夫依然有意为翠翠与二老的爱情奔走撮合。但“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使顺顺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好事的老船夫有关。虽不见诸形色,心中却有个疙瘩”^{[1](P284)}。而老船夫由于家境差距的关系,因而在顺顺父子前始终处于自尊与自卑交织的心理状态之中,想要解释什么却多次欲言又止,也就无法化解顺顺父子心中的疙瘩。直到心力交瘁的老船夫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夕抱憾终天,也未能真正化解其与顺顺父子之间的人心隔膜。

上述种种人心隔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以至于无论多么真诚,多么善良,多么相爱的人,彼此之间似乎谁也无法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人心隔膜是笼罩在湘西世界这一片人间净土之上的最大暗影,是它酿成了人与人之间一系列无法挽回的误会,推动着人物命运朝着悲剧化方向发展,也推动着小说氛围从明丽的田园牧歌朝着忧伤的挽歌发展。固然,酿成小说悲剧的原因有许多,就如作者沈从文自己曾说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2](P280)}用不凑巧来解释《边城》的悲剧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人心隔膜,却无疑是促成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更重要成因。

二

《边城》中人与人之间牢不可破的隔膜从何而来?应当说,来源也许是多方面的,比如老船夫与顺顺父子之间的心灵隔膜,就与双方身份地位家境的差距有关。在这种差距面前,善良的老船夫既感到自卑又不愿丧失自尊,加之因大老之死所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故而言行木讷犹疑,而顺顺父子对他的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无形中对人的束缚,又使得人与人之间有许多东西难以直接表达,男女间的爱情尤其如此。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湘西世界里男女之间的爱情表达也受其影响,何况翠翠乃是大自然的青山绿水滋养出的一位纯真的乡村少女,而非将“恋爱自由”之类的

时髦口号成天挂在嘴边的都市新女性。传统道德观念的无形约束以及恋爱中少女天然的羞涩心理,使得翠翠羞于将自己对二老的爱慕表达出来,结果老船夫、大老与二老都对她们产生了误会,不知道她内心究竟何思何想。所幸的是,湘西毕竟是偏远的化外之地,除了汉族,还有土家、苗、回、瑶、侗、白等各少数民族聚居于此,民风淳朴自然,较少矫饰,所以这片土地上的青年男女们还能以美妙热烈缠绵的山歌来表达爱情,这是他们比儒家传统相对深厚的其他地区的汉民族的幸运之处,但在小说中,这种可以让青年男女碰撞出爱情火花的方式,又偏偏被翠翠错过了。但上述并非《边城》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牢不可破的隔膜的最根本成因,其最根本的成因在人的本质特征之中。从本质上说,人心之间是很难相通的,即使在心地美好灵魂高洁的人们之间亦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最重要的工具是语言,可通过语言来传达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徒劳无功的。席勒说:“若灵魂而有言说,言说者已非灵魂。”^{[3](P454)}黑格尔也说:“语言本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表达人们所想的東西。”^{[4](P56)}苏珊·朗格也指出:“在人类的内在生命中,有着某些真实的,极为复杂的生命感受”,“对于这种内在生命,语言是无法忠实地再现和表达的”^{[5](P6)}除了语言,人类还有其他的沟通工具或方式,如眼神、表情、手势、文字等等。在某些特殊场合下,这些工具或方式也许能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传达我们的情感与思想时,同样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在《边城》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如此,无论语言也好,还是其他沟通工具或方式也好,都无法为消除人心隔膜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如果非要刨根究底寻找根源,我们不妨得出如下结论:《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其实是由神秘的天意所决定的,是天意要让湘西世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彼此无私地深爱对方,又是天意要让他们彼此永远无法借助于任何一种人际沟通工具走进对方的心灵世界。换言之,始终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膜,仿佛就是生活在湘西世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可改变的天命。

人心隔膜的结果必然是心灵的孤独,但打破孤独毕竟是人心最深处的永恒需要,于是我们常常发自内心地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文学是人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文学作品描写人心隔膜可谓多矣,虽则如此,《边城》所描写的人心隔膜,依然有其独特之美学特征和美学意蕴。在《边城》中,人心间

的隔膜始终未能获得有效化解,直到天荒地老,但《边城》中的人心隔膜,既非来自邪恶小人的挑拨,也非来自异己势力的阻梗。在小说第 19 节中,中寨人欺骗老船夫说船总顺顺已经答应团总家的提亲而二老也决定要碾坊不要渡船时,乃是出于自私目的,虽不乏奸诈,且老船夫的死与之不无关系,但与心如蛇蝎的恶意挑拨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1](P284)}的船总顺顺,也并不是其他许多古典和近代剧本或小说中那种为了维护门第或家族声誉而顽固反对子女某桩婚事的异己势力,若“二老当真喜欢翠翠,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1](P284)}。固然,《边城》中的人心之间存在隔膜且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其根源不能归之于邪恶小人或异己势力的存在。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作家们笔下的人心隔膜揭示了人类的根本性生存困境,因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在这一点上,《边城》中的人心隔膜与之不乏共通之处,但《边城》中的人心隔膜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人心隔膜依然不一样。如果说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作家们笔下的人心隔膜往往是丑恶如虫豸的人们之间的隔膜的话,那么《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则是善良如天使的人们之间的隔膜。正因为如此,与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作家们笔下的人心隔膜相比,《边城》中的人心隔膜所具有的悲剧意味更为浓郁也更为隽永。如果是天使与魔鬼之间无法相互走进对方的心灵世界倒也罢了,毕竟两者的心灵世界是南辕北辙的,永远不会有交集。如果是魔鬼与魔鬼之间无法相互走进对方的心灵世界也同样罢了,心灵世界一词又如何能用在魔鬼身上呢?但一群真诚善良富于神性且深爱着对方的人们在历尽了悲欢离合之后,依然阻隔着重重心灵之膜,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精神世界的喜怒哀乐,无法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沟通,人生之悲,孰甚于此。《边城》结尾处最让人心酸的,还不是翠翠在渡船上翘首等待心上人归来的孤独身影,而是远走他乡的二老依然不知翠翠早已心仪于他并为他梦萦魂牵,坚贞不渝。那么天意为什么要在一群富于神性,彼此深爱对方的人们之间设置那么多的心灵隔膜,而不让他们的心灵融为一体呢?这或许是永远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迷吧!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人心隔膜,《边城》中的人心隔膜更富于宿命意味,也更能激发读者深长的人生感喟和美丽总是令人哀愁的审美体验。如果说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作家们笔下的人心隔膜带给读者的主

要是关于人性的荒诞感与绝望感的话,那么《边城》中的人心隔膜带给读者的,则更多是关于人之命运的沧桑感与悲悯感。

《边城》无疑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杰作,读者和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自然美、风俗美、人情美,赞叹它的人心向善,赞叹它的田园牧歌情调,但实际上,仅有上述方面是不足以让《边城》成为一部旷世杰作的。它那关于命运无常以及人心隔膜的深刻描写,才真正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底蕴,使作品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形而上的深长艺术韵味,从而奠定了《边城》作为一部经典杰作的地位。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P44)} 沈从文先生未免过于悲观了,他说的情况虽然确实存在,但任何一个真正具有艺术鉴赏力的读者,是不会忽略其作品中传达出的包括关于人心在本质上是无法沟通的这一命题在内的痛楚体验的,李健吾、朱光潜、汪曾祺等老一辈学者或作家关于《边城》的评论,即可证明这一点。正如汪曾祺先生指出的:“《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7](P587)} 在湘西世界这片没有欺诈、争夺与杀

戮的人间净土上,与命运无常一样,人心隔膜显然也是给读者带来悲剧感的最大根源之一。如果说,是美好的自然环境,奇异的民间风俗,淳朴的人性人情,以及纯净如水的两性之爱,赋予了《边城》醉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的话,那么,湘西世界里真诚善良的人们的无常命运和他们之间茫然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人心隔膜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氛围,则赋予了《边城》发人喟叹的艺术深度。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边城[A].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2]沈从文.水云[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3]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5](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6]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汪曾祺.又读《边城》[A].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上接第47页)

境,建基于‘回首向来萧瑟处’的人生历程之上,这是苏轼身体力行后所得出的真切感悟;而其‘回首向来萧瑟处’的人生历程,则可具体表述为:在对‘人生如梦’的真切反思中,发明自性,师范渊明。这也正是其所谓‘归去’的真实意蕴。‘人生如梦’,既然‘人生若寄’,而‘寄者固归’,因此,复归一梦,当是人生的必然选择。如此,苏轼便藉由超验存在,在打破理想与现实之阻隔后,进入到了一个‘超人文非人文之世界’^[1]。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探索与选择中,苏轼最终从现实苦痛中彻底跳离出来,进入了一个自在洒脱的超越之境。

因乌台诗案而遭贬黄州的苏轼,初到黄州伊始,就以积极的心态调适自我心绪,努力从乌台诗案给自己留下的阴影中走出来。经由孤寂的反思,苏轼将现实苦痛视为人生之恨,并将其上升为生命历程中所必经的一部分,以抚慰自己一度痛苦的心灵。

在此基础上,苏轼以平和的心态反思人生之恨,藉由“人生如梦”的哲理领悟,最终步入了超然物外不忘世间的自在之境。如果说苏轼黄州词以及其在黄州的所有文学创作,最终向世人展示了其从苏轼向东坡的嬗变历程的话,那么,苏轼黄州词对其所遭受的人生苦痛的描述,以及其超越人生苦痛的情感历程,则为后世文人如何缓释心灵苦痛,提供了良多有益的借鉴。苏轼黄州词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亦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韩玺吾.“人生如梦”:苏轼的价值追求与自我超越[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 [2]韩玺吾.苏轼黄州词作与水性思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 [3]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